

近代新式媒体融入中国社会的路径

——以1876年江南“妖术”案《申报》表达为核心的考察

王润泽 肖江波

摘要

1876年,江南一带发生了非常具有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特色的“妖术”事件。作为新式媒体的《申报》利用中国社会熟悉的怪志小说的写法,融合有选择性的“真实”标准,加上“体制外言路”的谏言模式,完成了此次规模浩大的社会事件的报道与评论。这种模式一方面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鬼神”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为平息谣言提供了较为正确的态度和言论,成为近代新式媒体融入中国社会的一种路径。值得一提的是,《申报》已经被当时的读者接受,成为社会意见交流的平台。

关键词

新式媒体、妖术案、新闻介入、社会作用

作者简介

王润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电邮: wrunze@ruc.edu.cn;

肖江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电邮: elaine6977@sina.com。

The path of the modern new media merged with Chinese society: The exploration of ShunPao news report about Jiangnan Sorcery Case in the year of 1876

WANG Runze, XIAO Jiangbo

Abstract

In 1876, the “Sorcery Case” with Chines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happened in Jiangnan area (a region of south side of Yangzi River). By using the narrative method of Chinese mythical stories (a type of classical novel which featured ghost stories and was popular in Qing Dynasty), ShunPao published articles and critiques about this influential case with the selective criteria of truth and expostulation outside the normal way. This model of reporting which became the path that new media merged with Chinese society not only catered

to the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 about “ghosts and gods”, bu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quelching rumors in a way of positive attitudes and comments. Most importantly, this paper found that ShunPao had been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and successfully acted as the platform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social events.

Keywords

new media, the Sorcery Case, media involvement, social effect

Authors

Wang Runze is th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e is also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director of Confucius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Email: wrunze@ruc.edu.cn.

Xiao Jiangbo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elaine6977@sina.com

近代报刊出现后，不论是作为“舶来品”还是“新知”，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能否融入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社会，被其认可和接受？作为野心勃勃要为中国人办报的《申报》，刚刚在上海诞生后，就提出其所代表的“新报”与中国社会传统邸报的异同：“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闻也，是邸报之作成于上，恶新报之作成于下。邸报可以备史臣之采择，新报不过如太史之陈风，其事虽殊，其理则一，其法虽异，其情则同也。”（申报，1872年7月13日，《邸报别于新报论》）这段表白和分析，有为“新报”合法性阐明之意，一方面表白新报的“事”“法”之特色，更重要的是从“理”“情”的角度提出自己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契合之处。从当代新闻传播学角度看，可以理解为其既要坚持新闻传播业之本色，又要为中国社会扮演积极角色的心态，暗示了近代报刊融入中国社会的路径。之后不久，他们又对此进行引申，表示要践行“辟新奇，广见闻”的新闻专业作为，期待能实现“通上下之情意，足为政治之良规。西国之兴多藉乎此”的良好社会功能（申报，1876年1月29日，《论日本禁止新报》）。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近代报刊一方面在业务上要对西方母报进行模仿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是要适应中国，为中国社会提供“有用”的社会功效。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才能如其所愿，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起到当时社会已有的官方邸报、政府公告等传统媒体无法达到的社会功效。如何能深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处，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入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关乎新报是否能生存的关键问题。

特色的“妖术”事件。事件发生后，作为社会新型力量的报刊是如何介入到这一事件的进程中的？对社会起到何种作用？是否发生了其所期待的传播效果？成为我们审视新式媒体“植入”中国文化的很好的机会。

环视当时中国的报刊，两份报纸进入我们观察的视线，一份是清末外国传教士主办的《万国公报》（1868年创刊，名为《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其内容开始过渡到非宗教报刊），一份是英国商人美查等创办的《申报》（1872年上海创刊）。选择这两份报纸作为观察对象，一个是因为这两份报纸都是上海创办的，在当时江南一带算是影响最大的，前者对中国上层社会影响深远，后者的阅读面则向市民阶层渗透不少。如果前者代表了已经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并自诩为中国社会建议者的西方媒体的态度和做法，后者代表了以力图体贴、反应和融合中国文化为特点的媒体态度与作为的话，那么观察这两份报刊，我们会得出比较有趣的结论。

一、1876年妖术事件与《申报》的表达

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妖术的记载并不少见，也是统治阶级防范的重点之一。

“剪辮摄魂”术是清朝年间数次起源于江南一带的妖术，由于当时社会整体生产力低下，社会缺乏起码的科学常识，加上连年天灾不断，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尖锐，妖术谣言传播与政治统治危机相伴，互相作用，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恐惧和惊慌，造成社会不安与动荡。¹现代研究发现，这种所谓妖术实际上肇始于民间流传的用生魂造桥的谣言（即如果能用一些妖邪之术收到活人，尤其是男童的魂魄，可以在建桥合拢之时，让工程更加顺利；但失去魂魄的人最终将死去），这一谣言在江南建桥时常会出现，只是没有合适的土壤一般很快就消失了。但一些特殊时期，简单的谣言会引发成危害社会秩序、带来社会恐慌的破坏性事件。突出一例就是发生在乾隆年间的江南“叫魂”事件。²1876年（清光绪二年），以剪人发辮摄取魂魄的妖术恐慌再次从南京出现，很快席卷江南，甚至北京、天津、直隶地区也被波及，最后地域广布半个中国。而妖术也从“纸人剪辮”、“叫摄生魂”、衍化为“遍剪鸡毛”、“梦魇惊人”（或“妖物厌人”）“化毒蛇异物”、“阴兵过境”等可怕妖术。“妖术恐慌”的迅速蔓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社会秩序混乱，一些人趁机兴崇，白莲教、破钱教等民间反官府力量，以及流窜于各省间的散勇趁机扰乱社会，官府中个别人借此敛财和公报私仇等，百姓生活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最终引发涉及外国人的教案……在涉外压力下，统治阶层加大治理力度，一

场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才渐渐收场。³

根据申报的记载,最初谣言产生是在1876年2月中旬以后,但《申报》并没有马上介入进行报道。同年3月3日,《申报》报道了《修桥》,客观叙述了几座需要维修的桥梁,第一次出现了金陵城南造长干桥这一谣言产生的“介质”;一个月后的4月4日,第一次出现了《剪辫子》的报道。此后,随着事件的发展,《申报》详细追踪了这一事件的发展脉络。以“剪辫”“妖术”“打印”为关键词在《申报》数据库进行搜索,自1876年4月到1876年的12月,共获得有关于此事件的报道约96篇,据此估计,《申报》关于此事的报道和延伸报道保守估计大约应在120—130篇左右。从报道总量上看,报纸对这一事件的跟踪可谓不深入全面。其报道形式主要有:(1)新闻消息,刊登各地剪辫事,官府捉拿教匪等报道,具有新闻5W要素;(2)评论,如5月10日《论各处剪辫事》、5月26日《再论剪辫事》和《剪辫琐论》、《邪不胜正论(一、二、三)》等;(3)读者来信,如5月19日刊登的来自“惘世人稿”的《剪辫急宜查究》等。

从文本分析看,真实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伴随着详细的妖术细节描写以及民间传播的破解之法、民众与官府的各种对策,成为新型媒体介入谣言传播的内容模式;积极而有价值的事件线索分析,对官府的批评与建议,以及对剪辫等妖术及谣言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入探讨等,构成了新型媒体介入此次事件的意见模式。只是,新闻内容和意见表达,常常出现在一个报道文本中,并没有如现代新闻传播所主张的新闻与意见的分离。

二、《申报》的新闻模式

《申报》在按照新闻标准处理此事的态度上是颇有踌躇的。“新报之设原以记述传说之时事而已。若无稽妄语、惑众之妖言原不必纪,至于传谣之起,竟若确系实有其事者、且传说者不止一处身经者,已有多人,亦不能不姑且述之”。(申报,1876年5月10日,《论各处剪辫事》)该报屡次发布的类似不得已为之的矛盾心态,很值得玩味,显示出新式传媒面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矛盾心态。作为新式报纸,不应该传播这种无稽之谈,但既然很多人都经历过,那就进行记载报道,而且这一事件已经对社会造成动荡,百姓受到戕害,因此报馆不能坐壁上观。《申报》一方面详细记录了谣言的内容、传播路径和各种对社会危害的细节,另一方面也明确表明立场,不停对官府进行谏言,对百姓传递较为正确的态度和立场,为结束这场谣言做着自己的努力;在给后世留下大量研究素材的同时,也记录下新式媒体在

传统中国文化碰撞中的心态和作为以及介入中国社会的路径。

从新闻来源看,上海本地的信息是有人述之于报馆,而外地“剪辫事”的消息来源多为当地人士的来信,或许是各地分售处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读者。关于“剪辫”,《申报》每天都会收到读者来信,“南京扬州苏城之剪辫者,近据各友函述不一,”(申报,1876年5月5日,《剪辫续闻》)但是对于读者来信,《申报》并不是“有闻必录”,为了保证消息的可靠性,申报“其人其或无名姓住址者,本馆恐传闻异辞,概不登录”;(申报,1876年5月5日,《剪辫续闻》)“择其有名姓可考者约客登之”,“剪辫一事数日前本埠(即上海,笔者注)亦有人述之者,但无确据故未录入”。对于刊登出来的信息,首先表明信源所在,如4月20日的报道《剪辫续信》中提到“昨接稣友信谓吴门近日亦传言纷纷……”,5月3日的报道《纪扬州剪辫事》提到“此事据扬友函称人所共见共闻……”,5月10日报道“日昨吴友函来又述及……”;对收到来信中的事件要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等信息要十分准确,如“三月念八日未刻,苏省中市街天成瑞洋印花布店内之季沁泉,因与友人有事,特至南洞子门烟室……”,“本月初五日,西门二道桥侧王姓之子年十九岁,以磨豆腐为业,午睡醒后步出店门,邻人问曰汝辫何忽短?……同日新城马市口曹姓之书童偶自杂货铺买物归,亦忽辫失其半。此二事据扬友函称人所共见共闻”;而说到上海本市剪辫事时,也有事主的详细信息,“南市王家码头万盛?店主之女名曰培英,年十三岁,二十日四点钟与女小伴数人,偕行至间壁方万生烟店门前,突然辫子及红辫线减去一半”。从报道口吻中,《申报》开始并不相信此事,但只要信息来源尚属确切的,就给与刊登,因为不论事情是否真实,至少传言本身是存在的。而且报馆也明确说过,“存疑存信听之个人见解”。(申报,1876年5月25日,《剪辫到乡》)但到8月份,由于剪辫之事过多,因此报馆从不信的态度转变为相信“确有其事”,并主张用严厉手段对付施展妖术者,恢复社会秩序(申报,1876年9月15日,《论洋场止讹暗与古今》)。

从时效性上看,《申报》比较注意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在很多报道中,有“昨(日)”、“前日”、“三月廿八日未刻”等明确的时间,也有“近日”、“自XX以来”等比较模糊的日期。除了第一次听说传言没有及时报道外——“乃自二月半以后,城外忽传有剪辫子一说”,到其报道的4月4日有些时间上的间隔,剩下的都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报纸不是报道个别谣言的,除非谣言成风,已经影响到社会安宁,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后,报馆才予以关注。

另外,从报道涉及的地域看,《申报》的报道是客观和及时的,符合谣言传播的规律。从报道出现的金陵开始,而后向江南较大城市传播。苏州、扬州、上海、杭州、绍兴、宁波、湖州、嘉兴、常州陆续出现剪辮。剪辮谣言在江南各大城市传播的同时,又进一步向每个城市的周边县城和乡镇蔓延。如在上海,谣言先后在县城出现,后陆续传到虹口、浦东乡间。在苏州周边,常熟、昆山、吴江、盛泽也先后出现了剪辮谣言。4月至7月,传播范围集中在长三角一带,“起于金陵后及于苏垣,今又至扬州。”(申报,1876年5月3日,《纪扬州剪辮事》)“金陵苏扬外由浙而至上海、杭垣、浙江绍郡。”涉及的主要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扬州及其乡镇。根据报道时间,谣言几乎传遍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时间大致是两个月。紧接着,剪辮谣言又向长江中游传播,皖南、武汉等地也出现了剪辮谣言。⁴“剪辮一事初抵金陵、扬州、苏省上海浙及杭嘉湖等处,前月从皖南者及芜湖湾址经县宣州大通。”后世研究者多根据《申报》报道研究出谣言传播的时空路径。略记录如下,4月20日苏州出现剪辮,4月29日再述吴中剪辮、5月3日纪扬州剪辮事、5月16日纪上海亦有剪辮事、5月25日杭绍剪辮、剪辮到乡、5月30日杭垣亦有剪辮、5月31日吴中续有剪辮、6月3日双林镇亦有剪辮、6月9日嘉兴,6月22日常州、8月2日武汉剪辮事、8月15日南汇琐闻。从统计上看,《申报》4月份报道6篇,5月份23篇,6月份12篇,7月份2篇,8月份15篇,9月份32篇,10月份4篇,11月和12月各1篇。可以发现,5月、8月、9月为报道的高频率发布期,对剪辮过程的叙事模式,有点类似中国志怪小说式,现场感极强:“旋风一阵,风中若有一团黑影吹至面前不觉毛发森竖,风过处发即失去或二五寸或八九寸不等、然至短亦连发梢一二寸,从无一失去发线者。”被剪发之人“大半童子余则市井小民从未敢剪衣冠中人。”(申报,1876年5月25日,《剪辮到乡》)此外,描写行妖术“纸人”的样子,“纸人一个计五寸余长、剪成武士像,腰画书战裙、着靴,右手持剪、左手持牌,前胸画一太极图,后颈书三圈圈、内写天地人三字,背上写大球贯出八十七号,两足皆有符印,身上许多血点,剪口亦涂红纸,此杨友所目见。”从报上记载,还有纸人剪鸡毛、妖物压身、打印、阴兵过境、纸人割妇女乳头、取人首级等越来越荒诞离奇和“威力大增”的妖术,都有现场声音、色彩、感觉等各种细节描述,但语气尽量客观平和。

其新闻报道内容还涉及多个方面。此事在社会上造成的动荡与破坏,《申报》也一并详细记载。由于官府不作为,因此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民间自为团练互相保护”(申报,1876年8月26日,《苏常近事琐记》),对往来的可疑人进行身份

的排查,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无辜的民众被误打或者被误杀。“因音同字异而身受剥肤之灾”一男子捡到一条辫子,因“捡”与“剪”同音,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将其暴打扭送官府,经一老人澄清此人才脱罪(申报,1876年8月23日,《剪辫笑谈》)。无锡贩猪客被民团搜出剪刀三把,被指为剪辫,在没有实据的情况下,便将三人斩首其余两人交给县衙询问后得知此五人均是贩猪客,所带剪刀因买猪时须就猪身剪毛作记(申报,1876年8月26日,《苏常近事琐记》)。甚至有地方百姓不满官府不作为,而私设刑堂,用石灰活埋过往可疑人员达百数十人之多的恶性事件。

最终,这场来自中国社会下层的谣言事件和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传教系统发生了联系,威胁在华传教士的安全,成为促动官府重视并行动起来的重要原因。由于民众怀疑的逃犯进入外国教堂获取庇护,“获到作法之人送县,经神甫讨出,于是民心愈不能平。”(申报,1876年8月25日,《详述无锡民教不和事》)民众把矛头指向外国教堂。“教堂作大会,神甫恐生事端,先于二十五日亲至锡(无锡)、金(金匱)两县,请官出示谕,以谣言惑众,例干严禁,剪辫厌人并无其事等语。并令两县派拨官亲随带壮丁及守备、千总、外委、营兵齐赴天主堂门前看守,酬劳犒赏。是日,教中集有三四千人,颇形热闹,然百姓见之,更忿形于色。”而江阴县传来一则破除妖术的方法,即以白石灰画“十”字于街道地上,妖术立破。天主教神甫当然不依不饶,又到锡、金两县衙门咆哮,两县随即传谕各保,勒令将已画的“十”字务期洗刷净尽,并威胁尚敢再违,定干究办。其后,无锡居民时常拿获施行“法术”的渔民,民众的暴力添上了反洋教色彩。虽然官员知道有些剪辫妖人混进了教堂,受到外国教会的庇护,但是又不敢滋生事端。一再否认事件与外国洋教有关,而是把矛头指向国内的邪教。《申报》也在报道中称“前据庐州所获之教匪供词实系九龙山和尚主使名为半钱教与洋人无干或锡金之丝网船户明托天主教暗结半钱教则为可知,神甫不察力为教友袒护,人因是一疑百疑耳。”(申报,1876年8月25日,《详述无锡民教不和事》)

《申报》还对如何防止和破解妖术进行了报道。“药方”有些是来自民间,读者送到报馆的,有些是来自官府的文告。金陵刚出现剪辫谣言时,地方民众开始用黄纸朱书“哇喃咱叱咩”贴在帽子里,或者“等风来时急用污秽物等物抛向纸人”杭州人也用黄纸朱写辟邪字样贴于左门,或佩戴在身上等。谣言内容最初为“叫魂”和“剪辫”,随着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剪辫”又演变成复云压人、“阴兵过境”。《申报》也刊登了详细的出自《警富新书》的辟邪办法,“剪辫有药可以

治其芳：朱砂、雄黄、金银花、青柯、藤末、獨蒜子，又另写二字同药煎洗，洗时默念咒语三遍，咒曰割……”（申报，1876年5月19日，《紧防剪辫》）。民间传统对付妖术的如粪桶、女人褰衣、阴津、月信纸，官府布告上的红印等都成为辟邪利器。“剪辫”一事兴起，官员们的行为并没有比普通民众开明多少。根据美国传教士何天爵的回忆，据他观察，当剪辫妖术恐慌传播到北京后，北京的官员发布了许多通告，但“每张通告的内容与其说起到了消弭人心混乱的效果，倒不如说它雪上加霜，更增加了人们的骚动不安，这些通告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出门，不要与陌生人接触，一定要看好孩子，然后提供一些民间的巫术偏方保护辫子。”（苏萍，2001：176）

三、《申报》的意见模式

虽然《申报》过多细节的报道，让有的读者会有不适，也有以讹传讹的嫌疑，但值得肯定的是，《申报》在此过程中，数次表明立场，发表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从现代的角度分析，也是很有启发的。

最早通过事件发展的现象进行分析，不停质疑剪辫事件的真实性，并指出有可能是流窜作案。4月27日，第一次从谣言流行的特点——当谣言出现在新的地区时，前一地区的谣言就消失了——推测可能是一个犯罪集团四处流窜作案。而且还从谣言不停升级，新谣言代替就谣言的现象分析，此事件可信度很值得怀疑。如被害者先说三日要死，后说七日必死，再后来又谈百日，其实真死又有几个？后来又分析为什么“妖术”仅加害下层人群，而洋场租界和富贵人家、正直人士几乎没有听说被害的，批评国人以讹传讹，自欺欺人、自作自受。江南一带自古有信巫好鬼之风，因此才能为匪类所用，渐成风气。即使这种事情是真的，也可以效法战国时期的西门豹镇妖、孔道辅打蛇以及王曾降帽妖等中国古代“压邪”的做法，将却有实据的行妖术之人正法，即民可安、国可定了。⁵另外，也借此提出加强教育，学习西人，“可见鬼怪之谈皆由人惊疑所致非实有其事也”，（申报，1876年9月26日，《仙人遇妖》）“外国不信命数鬼神之说，遂无命数鬼神之事，中国皆信其说，遂觉实有其事”。（申报，1876年11月3日，《论设法以救枉死》）甚至报纸还从历史的角度深入分析妖术在中国流行的悠久社会背景和原因，自皇帝蚩尤时代即有，贯穿古今；而且中国地大人多，种群复杂，但民心宽容，孔子也仅仅是“不语怪力乱神而已，并不禁世不许其有也”，因此也养成了只要不害人，即允许一些善用之术来为民造福，如用呼风唤雨之术，为百姓祈雨等。的确，当时《申报》上

常常刊登类似于魁星现于天，以及朝廷求雨等被当时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和行动。

对政府的谏言与建议。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地方官府处理模式从消极等待谣言不攻自破的要求大家“镇静”，进而悬赏捉拿，最后官员采取措施，巡逻、暗访、缉拿匪患等。申报对官府的作为，评价是中肯而及时的。当官府效古法，对妖术镇之以静时，《申报》即从各地反馈的社会不安情况出发，希望官府作为。4月13日开始，不停呼吁官府介入，“……类如此者，均系异端邪教煽惑人心，连日城厢内外谣传颇多，若不严访密查从重惩办，恐奸民暗施邪术，即不免酿成事端矣，有牧民之责者，所当急宜查办也。”（申报，1876年4月13日，《再述剪辫事》）另外，当苏州府总捕的亲弟弟被剪辫后，不作为的官府开始加紧查访，并禀告巡抚请天师捉妖，对此，《申报》站在民众的角度，对官府进行了批评，“何民间之辫轻如鸿毛，官场之辫重如泰山也？……为民上者若杜渐防微，严加查缉，则匪类自然绝迹，何必再请天师耶？乃必害及己身然后从而缉之，而民间之辫已剪去无数矣。然苏州查而别处仍不查也，嗟乎！今之父母斯民者，大抵欲保其身家而已，孰是真心保民者乎！此地方所以不治也。”（申报，1876年6月6日，《书苏州剪辫事后》）谣言肆虐之时，针对个别官员无动于衷，申报给予的指责更加严厉。但对一些认真负责的官员，也详述其巡查、暗访之经过，给官府治理提供正面积极的案例。如安徽知府亲自化妆为异乡寒士，打入剪辫妖匪团伙内部，最后将其一网打尽，从此安徽境内“邪匪绝迹”、“谣言不兴”，报纸也及时报道（申报，1876年9月16日，《留心民瘼》）。

最可贵的是，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记载中，发现《申报》已经被读者接受，成为社会意见交流的平台。如有读者署名“悯世人”投书申报馆，“屡见贵报纪剪辫之事，犹以为讹传，今而知实有其事也”，认为“上海五方杂处、藏奸尤易，其稽查之法，先须在客寓烟间主意察访，如敢收留来路不明、形迹可疑之人，一经查出定当严？则匪类自无所潜踪矣。”（申报，1876年5月19日，《剪辫急宜查究》）报纸上刊登的治疗剪辫的药方，也是有人送到报馆的。报馆在8月31日刊登了《西人论近日邪术事》，指出西方人士认为邪术兴起与教育不到位有关，西方当“物理与格致各真学兴于民间，则邪术各虚传即为之止”。由于言辞中有讥讽无锡人在谣言面前“惶恐如狂”的表现，惹得一无锡读者发来一篇论说进行反驳，9月13日即登载在一版，《无锡人阅西人论近日邪术之事十不解》，虽然从行文中看，此人未受过科学知识的熏陶，仅从中国各代历史记载有关邪术的知识进行反驳，但报馆已

经在自觉的成为意见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为近代报馆融入中国社会生活的一大进步。但在信息来源上，与其说这是当时报馆现代报刊意识使然，不如说是因为缺乏专业访员，信源只能靠来信来函、各地投稿而为之。

四、《万国公报》的做法

面对这种很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事件，《万国公报》处理态度相当简单，明确表示不信谣言，并在1876年6月17日到6月24日通过登载了江南地方官府的辟谣告示意，经常摘录官员的奏章，表达自己的立场，对于谣言本身的内容和传播情况一概不予刊登，以防以讹传讹。它这样做的原因在于认为华人知识浅薄，缺乏见识，以讹传讹，以致小事酿成大患。“切作报者责任匪轻，受人之惑而转以惑人，维持世道之权，反为邪说之人所夺矣。”提倡此无稽之谈者，或出于偶然、无心，炫众惊人酿成巨祸，且或波及中外交涉之处，后悔就来不及了。（转引自张詠维，2007）。但该报通过报道一些天文现象的科学原理，来反击所谓妖物压人打印之说。《万国公报》刊登《辟邪说》系统表明了立场，“本报不登此等妄谈恐阅公报者信以为实，不将归咎于公报哉……本馆主不屑录卑贱之言而正悯无知之輩为卑贱所害也”（万国公报，1876年6月11日-1876年6月17日）；当事件矛头指向天主教和基督教时，也马上发表评论进行反驳。《万国公报》的做法比较符合当代科学的处理态度，不信谣，不传谣；但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有深厚的谣言传播温床，谣言已经对社会也造成重大影响，这样的处理态度有点明哲保身。所以虽然其目的是正确的，但不一定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一个是迷信风气太多，一个是此处谣言已经造成社会动荡，危害出现，报刊还无动于衷，就不是很合适的。

五、结论

《申报》的作为，利用中国社会熟悉的怪志小说的写法，融合有选择性的“真实”标准，加上“体制外言路”的谏言模式，完成了此次规模浩大的社会事件的报道与评论。在这一过程中，申报的报道模式，虽有西式报刊的真实客观理念的影子，但更多是中国文化影响。实际上，《申报》创办之初，即以西方媒体之“用”来还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需求之“本”。《申报》最初的新闻内容充分显示了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中低端文化读物的近亲关系。其在创办宗旨中就明确提出“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是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申报，1872年4月30日，《本馆告白》）

各种齐东野语、鬼怪小文、市井传奇等无不刊登其上。仅一年多时间，就有好事者总结《申报》所载内容为“小窃流氓，鄙道贫僧，恶少摸乳，老翁猥臀，某甲某乙，为隐其人”。（申报，1873年2月15日，《申报馆赋》）《申报》对此次剪辮事件的详细报道，整体上讲格调不高，但符合《申报》对新闻的定位。至于其评论，所持观念比较正确，质量比较高。而为什么《申报》可以批评政府，并在舆论监督上还有所作为，可能就是黄旦教授认为的“《申报》的社会新闻，包括其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虽有吸引读者之意，但不乏城市挑战国家的政治意味。换句话说，恐怕正是因为暗含的挑战，引导并聚集了自己的读者。”（黄旦，2011）

这种模式一方面迎合了当时中国的“鬼神”文化心理，另一方面也为平息谣言提供了较为正确的态度和言论，成为近代新式媒体融入中国社会的一种路径。的确，作为舶来品的近代报刊来到中国后，必须对中国社会产生积极作用，才能被中华文化所接受。而传播媒介在文化的传播中，也重新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创新。来自民间传播的齐东野语、中国类故事等，这些明显属于文化类的内容，长期以来对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新式媒体出现后，这种文化现象经过媒体的过滤，包括选择，报道，评价，与官方互动等共同作用下，迷信类内容逐渐成为主流社会摒弃的文化内容——当然科学知识的普及更是作用巨大。“剪发摄魂”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出现的仅为光绪末年和1928年民国时期，而且持续时间越来越短、影响越来越小，从此彻底退出中国民间文化舞台（即使出现，也是个案，不会在社会上兴风作浪了），不能说没有近代媒体的贡献在其中。

（责任编辑：何容）

注释 [Notes]

1. 据吴善中研究，“叫魂”术实际上自古有之，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即有“妖人马祖，剪纸为兵以骇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七、八月之交，苏、常一带也有类似“妖人叫摄生魂”的恐慌事件发生。1768年发生在“乾隆盛世”的“叫魂”社会恐慌，更是延续三年之久。
2. 关于这一事件的权威研究为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3. 目前关于1768年的研究最权威的当属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而对1876年的妖术研究，苏萍、吴善中、徐茂明、张詠维等多有研究，比较全面的是后两位。张詠维《光绪二年剪辮事件所反应的江南社会》（2007年第10期《中正历史学刊》），徐茂明《谣言与秩序——光绪二年江南系列谣言案研究》（2004年4月《历史人类学学刊》），两文全面分析了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社会各阶层的混乱反应与各种对

策等, 从一个小事件展现了清末社会全景。本文则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对笔者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分析。

4. 徐茂明在《谣言与秩序》一文中, 也有此叙述, 除个别日期外, 笔者观察与徐教授一致。
5. 《申报》评论《论洋场止讹暗与古合》, 《论中国历朝常有邪术》等都有此种意见的表达。

引用文献 [Reference]

申报(1872年-1876年).

[*ShunPao* (1872-1876).

苏萍(2001).《谣言与近代教案》.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Su Ping (2001). *Rumors and anti-religion cases in modern times*.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ing House.]

转引张咏维(2007). 光绪二年剪辮事件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正历史学刊》, (10), 106.

[Quoted in Zhang, Yongwei (2007). The Jiangnan society reflected by braid cutting events in 1876. *Chung Cheng Journal of History*, (10), 106]

万国公报(1876年6月11日-1876年6月17日). 辟邪说.《万国公报》.

[*WanKwohKungPao* (June 11, 1876-June 17, 1876). Counteracting evil forces. *WanKwohKungPao*]

黄旦(2011). 媒介就是知识: 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 (12), 147.

[Huang Dan (2011). The medium is knowledge: the origin of China's modern thought of the press. *Academic Monthly*, (12), 147]